

Spring 2014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March No.24

2014年3月 第二十四期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 24 期
2014 年 3 月

主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王惠英
设计：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86-10-88813845
传真：86-10-88813842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100089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理事长

编委会顾问

王恩哥 北京大学校长
陈吉宁 清华大学校长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理事长
苏志武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黄泰岩 辽宁大学校长
朴永浩 延边大学校长
林建华 浙江大学校长
Phung Xuan Nha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l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Artbazar Galtbayar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Tin Tun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王孙禺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周云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晓京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强一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Kyaw Nai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Javzan Batkhuu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CONTENTS

目录



P.02

→ 2014年1月3日，由中国传媒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中国湖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十一届亚洲传媒论坛”在湖南省长沙市隆重召开。



P.05

→ 马来西亚历来是吸引人类学家开展田野作业以探索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地方，其本土人类学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如今已结出累累硕果，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

特稿

- 02 “第十一届亚洲传媒论坛”在湖南长沙举办

研究进展

- 05 马来西亚本土人类学发展述评
18 中国与加拿大的能源合作——基于中国能源安全视角
26 对亚洲几国中央银行资本金的观察和比较研究

研究机构

- 36 亚洲民族与文化的研究基地——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



“第十一届亚洲传媒论坛” 在湖南长沙举办

2014年1月3日，由中国传媒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中国湖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十一届亚洲传媒论坛”在湖南省长沙市隆重召开。本届论坛以“新趋势·新挑战·新方向”为主题，围绕在媒体领域如何有效地挖掘和运用数据，建立适应时代发展方向的思维逻辑，

进行实战经验分享和前瞻性讨论。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魏委，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中国传媒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丁俊杰，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吕焕斌，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郑



苏志武



朴仁国



魏委



丁俊杰

视农等嘉宾出席论坛。来自英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的传媒行业领袖和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苏志武校长在致辞中指出，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数据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活，也为传媒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他表示，希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促进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

朴仁国事务总长在致辞中表示，本届论坛选择聚焦“大数据”，既合乎时宜，又意味深远，他期待开拓高校和传媒集团合作的成功范例。

魏委副部长在致辞中强调，论坛围绕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共同探讨转型发展之路，既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也为各界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本次论坛肯定了大数据在解决社会和商业问题方面的重大作用，并立足于学界，应用于业界，为传媒领域的未来发展点明了方向。在主旨发言中，吕焕斌台长指出，对于传统广播电视媒体而言，新的媒体环境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机遇，因此适应大数据时代并随之调整



发展战略，对广电媒体有着重要意义。捷孚凯（GfK）亚太地区媒体部商务总监 Lee Risk 先生认为，新媒体终端不断推陈出新，但是传统媒体并没有被抛弃，如何进行多屏评估是媒体行业应当关注的焦点。此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明品、韩国 MBC 电视台国际新闻部部长金炯泰、人民网副总裁官建文、万博宣伟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希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以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沈浩等嘉宾也发表了见解。

亚洲传媒论坛创办于 2002 年，至今已有 11 年的历史。本届论坛下设“大数据时代下的

广播电视节目的评估模式”、“大数据时代下的广播电视节目创新与融合发展”等六个分议题，围绕这些议题，参会者从广播电视评估、媒介融合、新闻创新、移动互联网演进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大数据背景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在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这一关键性问题上达成了策略共识。

摘自 <http://news.cuc.edu.cn/article/31932/>



马来西亚本土人类学发展述评¹

康敏 / 北京外国语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

摘要

马来西亚历来是吸引人类学家开展田野作业以探索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地方，其本土人类学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代，如今已结出累累硕果，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马来西亚的本土人类学研究主要围绕社会发展、族群身份认同、社会性别和生态保护这四大主题展开。近来人类学研究的趋势呈现出理论、方法和主题的多样化，跨学科成果层出不穷，但对社会发展的关注一直贯穿始终。马来西亚本土人类学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学科和学者的社会贡献大、国际化程度高，但也存在着地区研究上的不平衡和人类学家当中的族群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关键词

人类学 马来西亚 民族志 社会发展 族群认同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马来西亚独立后人类学发展述评》的研究成果。

一、引言

马来西亚所在的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岛¹历来是人类学家开展民族志田野调查的理想舞台。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的人类学研究绝大多数是由英国人类学家或在英国接受学术训练的人类学家完成的,此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荷兰、德国、加拿大等国的人类学者纷至踏来,他们生产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不仅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社会—文化转型,也共同促进了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发展。事实上,有一些出色的研究成了人类学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同时激发了在其他地方开展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的兴趣。²中国国内学术界对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人类学发展状况较为熟悉,但对同属发展中国家的马来西亚的本土人类学发展知之甚少。

本文旨在考察人类学这一学科在马来西亚扎根成长的过程,因此将研究焦点放在那些成长于马来西亚、在国内或国外受过人类学训练、长期活跃于马来西亚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界的本地学者身上。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马来西亚在国家性质、行政制度、教育体系和科研建制等方面与英美国家有亲缘性,学生和学者们在国内和国际

本文旨在考察人类学这一学科在马来西亚扎根成长的过程,因此将研究焦点放在那些成长于马来西亚、在国内或国外受过人类学训练、长期活跃于马来西亚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界的本地学者身上。

流动比较频繁。多数生长于马来西亚的人类学家是在国外(主要是英美和澳大利亚)接受的专业训练,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也有一些人虽然在国外求学期间回国内开展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但毕业后就留在国外生活工作,更改了国籍;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冉迁往国外的也有不少。另一方面,有些生长于国外的人类学家,由于长期在马来西亚开展田野工作,他们与马来西亚人类学界的联系非常紧密,通常都受聘于当地某所大学,或者在各个大学的研究机构访学。因此,本研究在本土人类学家与外国人类学家之间所做的区分仅仅是粗略的、灵活的,也仅仅是出于分析和比较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考虑,并非要将

本土人类学与外国人类学对立起来,更不是要否认或贬低外国人类学家所作的贡献。正如同时活跃于马来西亚和中国学术界的人类学家陈志明所言,“将本土人类学与外国人类学相对立的讨论可能是无意义的,好的人类学最终要求有好的民族志,这和民族或国籍没什么关系。”³

二、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人类学

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人类学学科建设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人类学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相比于中国,马来西亚的人类学教育起步较晚。虽然马来西亚很早就有人类学家活动的身影,但人类学独立成系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直接的促成因素是1969年的族群冲突。1969年5月,马来西亚爆发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场种族流血冲突。在马来亚大学(Universiti Malaya,简称UM)、马来西亚国民大学(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简称UKM)和马来西亚理工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简称USM)开设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专业,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力量加深对族群问题的理解,消弭种族冲突,促进国家团结统一。新成立的人类学社会学系需要大批师资,

1 从自然地理上看,马来西亚的国土是由马来半岛(俗称西马,旧称马来亚)和婆罗洲岛北部(俗称东马,印尼称婆罗洲为加里曼丹岛)这两大部分构成,它们隔着南中国海遥遥相望。地理上的分隔使得人类学研究也自然地分为对西马的研究和对东马的研究两部分。总体上看,马来半岛的人类学研究较为发达,且来自西马的学者很少在东马进行研究。

2 Victor T. King and William D. Wilder (eds.), *The Modern Anthropolog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 308.

3 Tan Chee-Beng, *Anthropology and Indigenization in a Southeast Asian State: Malaysia*, in Shinji Yamashita, Joseph Bosco and Jeremy Seymour Eades (ed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p.324.



除了从早已存在的马来研究领域和国外大学招募学者外，马来西亚政府出资输送大批有潜力的学生或教员前往英联邦国家或美国攻读人类学硕士、博士学位。他们几乎都回马来西亚开展田野调查，不仅研究马来人，还有马来半岛、沙巴和砂拉越¹的其他族群，这些研究主题广泛，且运用了当时流行于欧美国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²目前，马来西亚开设人类学专业的高校有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西亚理工大学、马来西亚沙巴大学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

(Universiti Islam Antarabangsa Malaysia)、马来西亚砂拉越大学 (Universiti Sarawak Malaysia)、马来西亚苏丹扎因阿比丁大学 (Universiti Sultan Zainal Abidin)。其中，前三所大学里的人类学学科发展历史最为悠久，科研实力最强。

总的来看，马来西亚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人类学学科发展有如下特点：第一，人类学一词主要在狭义上使用。广义上的人类学包括了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四大分支，但在马来西亚，人类学仅指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

灵长类动物和人体特质的体质人类学一般归入动物学或医学领域，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则归入历史学或地理学。

第二，马来西亚的人类学与社会学不分家，甚至往往与其他学科（如心理学、地理学）合而为一。例如马来亚大学的人类学社会学系包含了心理学专业，马来西亚国民大学的人类学社会学系则与地理系、科学发展系同属于“社会、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在上述几所最重要的大学中，“人类学”都是摆在“社会学”之前，称“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他们通常将人类学和社会学合称为“Ansos”，³认为在马来西亚，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学科界线并不像其发源地那样泾渭分明。⁴

第三，人类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有很好的声望与前景。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私营企业都很愿意雇用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因为他们熟悉马来西亚的每一个族群，了解他们的亚文化和刻板印象。例如比起学金融的学生，学过人类学的学生是更出色的贷款业务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因为他们知道每一社群的借款习惯、借贷担保物上的文化偏好。⁵

1 本文中对马来西亚各州地名的翻译以“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提供的译名为准，可能与国内通常的译名不符。具体请见网页 <http://mandarin.bernama.com/v2/trans.php>。

2 A.B. Shamsul, Anthropology, Identity, and Nation Formation in Malaysia, in Shinji Yamashita, Joseph Bosco and Jeremy Seymour Eades (ed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p.295-296.

3 取自英文 anthropology 和 sociology 中的字母。

4 Rahimah Abdul Aziz, Pengajian Ilmu Antropologi dan Sosiologi di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Menoleh ke Belakang, Melangkah ke Hadapan. *Akademika*, vol. 66, 2005, p.51-80.

5 A.B. Shamsul, Anthropology, Identity, and Nation Formation in Malaysia, in Shinji Yamashita, Joseph Bosco and Jeremy Seymour Eades (ed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p.298.



第四，人类学家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创办或参与创办了许多有影响的研究机构，开辟了大量新的研究领域。例如马来亚大学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马来研究院曾经主要是由人类学家构成的；马来西亚国民大学的“西方研究所”、“族群研究所”是由著名人类学家沙姆斯·阿姆里·巴哈尔丁(Shamsul Amri Baharuddin)创办的，他曾长期担任“马来世界与文明研究所”的所长(1999—2007年)；另一位著名人类学家瓦齐尔·贾汉·卡里姆(Wazir Jahan Karim)教授则在马来西亚理工大学创办了全马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都鼎鼎有名的“妇女发展研究中心”。

以高校为基地，马来西亚的人类学家培养出了大批建设现代国家的高层次人才，也开展了大量旨在造福国家与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在大学之外，还有许多人类学家活跃在各种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各类政党、研究机构，以及大众媒体，有的人类学家则是以独立学者的身份开展研究。简而言之，人类学家在马来西亚社会科学界是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人类学在社会科学里也属于一门有影响的显学。

三、人类学研究的四大主题

任何一个社会的精神科学都是其时代的产物，马来西亚也不例外。从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独立成系至今，

经过40多年的发展，由马来西亚本地学者完成的人类学研究硕果累累，它们多数都聚焦社会发展、族群身份认同、社会性别与生态保护这四大主题。

1. 社会发展

自独立以后，马来西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由一个以农村和农民为主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和工人为主的现代化工业社会，人类学在社会发展研究方面的主题变换很好地反映了这一过程。¹

最早在马来西亚进行研究的职业人类学家是英国人类学家弗思夫妇，²在他们的影响下，英国人类学家对马来农村社会—经济的兴趣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与外国人类学家特

1 由于马来人是马来西亚人口最多、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族群，马来人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了马来西亚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对马来西亚社会发展的人类学研究是以对马来人群体的研究为代表。

2 雷蒙·弗思(Raymond Firth)的代表作为《马来渔民：他们的农民经济》(1946年)，他的妻子罗斯玛丽·弗思(Rosemary Firth)的代表作是《马来农民的家务管理》(1943年)。

别关注社会—经济组织不同，马来西亚本地学者似乎更关心马来社会的政治结构。塞义德·胡辛·阿里(Syed Husin Ali)是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本地人类学家，他先后师从于迈克尔·斯威夫特(Michael Swift)¹和雷蒙·弗思，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英国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塞义德·胡辛·阿里在马来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于1959年末到1960年初在巴甘村进行了四个月的田野调查，1964年出版了《巴甘村的社会分层》²一书，描绘出一个马来村庄的阶级和地位结构图，该书已经成为研究马来社会的经典之作。塞义德·胡辛·阿里不仅关心农村社会的分层问题，也研究马来人的贫困问题和地方政治，³是马来西亚最知名的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曾长期担任马来西亚人民党(Parti Rakyat Malaysia)主席(1989—2003年)。塞义德·胡辛·阿里最初是在马来亚大学的马来研究系任教，人类学与社会学系成立之后他就成为主要负责人，并且任教三十余载，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将人类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完成，马来西亚的人类学家也开始面临新的社会发展问题，如移民、城市化问题、医疗和公共健康、犯罪、社会公平等等。

学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密切关联的学术取向影响了一大批人，也影响了人类学在马来西亚国家建设中的学科定位。如今活跃于马来西亚社会科学界的沙姆斯·阿姆里·巴哈尔丁教授⁴也以地方上的马来政治研究而闻名，2008年获福冈亚洲文化奖的学术研究奖，他的代表作《从英国的统治到土地之子的统治：马来半岛的地方政治与农村发展》⁵也荣获多个奖项并多次再版。

在马来西亚人类学界，研究马来社会的主要是马来人，但也有一些非马来学者。王英波(Diana Wong Ing Boh, 音译)博士在被称为马来西亚“饭

碗”的吉打州进行了一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出版了《形成中的农民：马来西亚的绿色革命》。⁶同年，成长于马来西亚、现就职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王爱华(Aihwa Ong)教授出版了她的成名作《抵抗精神与资本主义规训：马来西亚的工厂女工》，⁷这也是社会性别领域的一部经典之作。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完成，马来西亚的人类学家也开始面临新的社会发展问题，如移民、城市化问题、医疗和公共健康、犯罪、社会公平等等。马来亚大学人类学社会学系的罗齐娅·奥马尔(Roziah Omar)教授是医学人类学博士，擅长的研究领域为社会发展、妇女研究、生殖健康、老龄化与社会等，是多个政府部门的顾问。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IKMAS)首席研究员阿齐扎·卡西姆(Azizah Kassim)教授则擅长跨国移民研究。同样关注移民问题的还有刚才提到的华人人类学家王英波，其论文《非法交易的谣言：边界控制、非法移民与民族国家的主权》⁸已经成为移民问题

- 1 雷蒙·弗思的学生，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马来半岛的森美兰州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市场、商品化的扩张以及政府行政管理的建立对农民经济的影响。
- 2 Syed Husin Ali,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Kampung Bagan*, Singapor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4.
- 3 Syed Husin Ali, *Malay Peasant Society and Leadership*,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4 他在马来亚大学读书时就是 Syed Husin Ali 的学生，后来留学澳大利亚又师从 M.G. Swift 做博士研究。
- 5 A.B.Shamsul, *From British to Bumiputera Rule: Local Polit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Peninsular Malay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6.
- 6 Diana Wong, *Peasants in the Making: Malaysia's Green Revolu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7.
- 7 Ong Aihwa.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 8 Diana Wong, *The Rumour of Trafficking: Border Controls, Illegal Migration an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Nation-State*, No. 10. Institut Kajian Malaysia dan Antarabangsa (IKMAS),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2004.

研究中的经典。另外像流行文化、城市文化、网络与民主化等也成了人类学家探讨的新话题。

与马来人同属于人口中的“土著”类别的，还有塞芒人、伊班人、达雅克人等非马来人的其他少数民族，¹对这些“真正的”原住民群体而言，社会发展不仅意味着生计模式的急剧改变，意味着被迫从采集狩猎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跨越，也意味着面对被主流文化同化（伊斯兰化）的无奈。因此，对这些族群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研究增长极为迅速，我们将在“族群身份认同”和“生态保护”这两大主题下对它们进行讨论。

2. 族群身份认同

马来西亚是一个语言、文化和族群都相当多元化的国家，目前已经识别出的族群超过 70 个，²他们通常分为土著（马来人和原住民）、华人、印度人和其他（包括非马来西亚公民）四大类。³由于各族群在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生计模式、社会组织方式上

在马来西亚，族群性、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纠结在一起的，因此它们也是整个马来西亚社会科学界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课题。

都各不相同，马来西亚也成了人类学家们揭示人类文化多样性，探索族群间文化互动方式和文化变迁过程理想场所。

在马来西亚，族群性、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纠结在一起的，因此它们也是整个马来西亚社会科学界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课题。就人类学而言，它对族群问题研究所作的最大贡献就是基于长期的实地调查，采用参与观察和细致描述的方法，生产出优秀的民族

志，从而为其他学科的比较和研究奠定坚实的事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民族志作品都与族群身份认同有关。但如果从不那么宽泛的角度上看，人类学的族群身份认同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族群文化特征的描述，确定族群归属和族群性；二是在民族国家和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探讨族群身份认同的转变。这两部分内容既有时间上的先后次序，也有逻辑上的因果关联，即一般是先有对某族群语言文字、神话传说、信仰仪式、生计模式、亲属制度等各方面的描述和记录，然后才有全球化、现代化和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对文化遗产、文化变迁和文化身份认同的研究。

马来西亚的人类学界存在着明显的族群界线，“马来人类学家一般只研究马来人和（西马的）原住民，而华人和印度人社区的人类学很不发达，因为很少有华人或印度人出身的人类学家。”⁴在研究华人社群⁵的华人人类学家中，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要数陈志明

- 1 马来西亚的人口可以分为“土著”与“非土著”两类，在马来语中，“土著”即“大地之子”（bumiputera），也等同于“原住民”（orang asal 或 orang asli）。这是为了把更早就居住在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地区的人口与较晚才迁居到这里的华人和印度人区别对待。根据马来西亚宪法，马来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都被认定为是“大地之子”，但由于马来人（多数是从印尼地区移民到马来半岛）的人口远远超过马来半岛及东马地区真正的“原住民”（少数民族），所以马来人就自称代表所有的“大地之子”。事实上，马来人在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和生计模式上都与其他少数民族有着重大区别，所以本文在讨论社会发展进程时将他们分开处理。
- 2 根据传播基督教的 JOSHUA 项目的调查，马来西亚共有 184 个族群，称中国大陆有 513 个族群（<http://joshuaproject.net/countries.php>）。尽管该数据未必权威，但不妨碍我们进行国家之间的比较。
- 3 Madam Zarinah Mahari,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Malaysia: The Changing Roles of Wom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5th Conference of Commonwealth Statisticians, New Delhi, India (7-10 February 2011), http://www.cwsc2011.gov.in/papers/demographic_transitions/Paper_1.pdf.
- 4 Tan Chee-Beng, Anthropology and Indigenization in a Southeast Asian State: Malaysia, in Shinji Yamashita, Joseph Bosco and Jeremy Seymour Eades (ed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p.309.
- 5 对马来西亚华人最早的人类学研究是由我国著名人类学家田汝康先生完成的对砂拉越城市华人社会结构的考察。台湾知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也在 1985 年用中文出版了《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西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

(Tan Chee-Beng) 教授。他基于为期 17 个月的田野调查,完成了对马六甲峇峇和娘惹这一特殊的少数群体的民族志研究,其博士论文经修改后以《马六甲的峇峇:马来西亚一个土生华人社区的文化与认同》¹ 为题出版,成为海外华人社区研究和身份认同研究领域的经典民族志。陈志明教授还对马来西亚的原住民群体和新马土生华人等少数族群的文化遗产、文化认同、宗教信仰及语言问题有深入研究,是一位研究主题广泛,成果丰富的学者。周福堂 (Cheu Hock-Tong) 教授在学术上起步较晚,但同样著作等身。他一生致力于马来西亚华人宗教与文化、马来人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研究华人中九皇爷和拿督公信仰的专家。关于另一大族群——印度人的民族志,研究者和成果都更为稀少,值得一提的有研究马来西亚橡胶园里的印度劳工的印度籍人类学家拉温德拉·K. 贾殷 (Ravindra K. Jain)² 和研究马六甲 Chitty 人³ 的戴维·詹姆斯·默



恩斯 (David James Mearns)⁴。穆罕默德·优素福·伊斯梅尔 (Mohamed Yusoff Ismail)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马来人类学家,他研究的是生活在吉兰丹州信仰佛教的暹罗人,⁵ 这同样是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小群体。对上述小

群体的人类学研究有助于揭示身份认同转变的过程,也加深了我们对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

不管是从西马还是从东马来看,对马来西亚非马来土著群体的人类学研究远远要发达于对华人 and 印度人群体的研究。最新的人口普查 (2010 年) 表明,马来西亚的总人口约为 2833 万,非马来人的“土著”人口约为 333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11.76%。⁶ 西马的非马来人少数民族一般被称为“Orang Asli” (原住民),特指最早居住在马来半岛上的 18 个部落。⁷ 北婆罗洲的少数民族在沙巴以卡达山族 (Kadazan) 和杜顺族 (Dusun) 为主,占当地总人口的 24.5%; 在砂拉越以伊班人 (Iban) 为主,占当地总人口的 30.3%。⁸

相比于外国人类学家,马来西亚本地的人类学者对婆罗洲的关注相对较少,他们更多地是研究马来半岛上的原住民,但这也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事情。最早在原住民当中开展田野调查的是马来西亚国民大学的胡

1 Tan Chee-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8.

2 Ravindra K. Jain, *South Indians on the Plantation Frontier in Malay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3 说马来语的土生印度人,被称为“印度峇峇和娘惹”。2006 年, Samuel S. Dhoraisingam 也出版了《新加坡与马六甲的土生印度人》一书 (Samuel S. Dhoraisingam, *Peranakan Indians of Singapore and Melaka: Indian Babas and Nonyas—Chitty Melaka*, Pasir Panjang, Singapore: ISEAS Publications, 2006.)。

4 David J. Mearns, *Shiva's other children: Religion and Social Identity Amongst Overseas Indian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5.

5 参见 M. Y. ISMAIL,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ril, A Siamese Village in Kelantan. *Mankind*, 13(1982): 252-263, 以及 M. Y. Ismail, *Buddhism and Ethnicity: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 Buddhist Temple in Kelanta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6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2010)*, http://www.statistics.gov.my/portal/download_Population/files/census2010/Taburan_Penduduk_dan_Ciri-ciri_Asas_Demografi.pdf.

7 本文采用马来西亚官方的说法,但对于这些部落的命名和区分,学术界实际上还有争议。

8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2010)*, http://www.statistics.gov.my/portal/download_Population/files/census2010/Taburan_Penduduk_dan_Ciri-ciri_Asas_Demografi.pdf.

德·萨勒(Hood Salleh)教授(始于1971年),他基于对彭亨州百乐湖地区塞米莱(Semelai)部落的长期研究获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¹胡德·萨勒后来将研究对象拓宽至其他原住民部落,完成了多项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他还依托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培养了大批学生,是马来西亚原住民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一把手”。²马来西亚理工大学的瓦齐尔·贾汉·卡里姆则是最早研究原住民的马来西亚女人类学家。1974—1976年,她在马来半岛西岸凯利岛(Carey Island)红树林地区的马美力族(Ma“Betise”)部落进行田野调查,主要研究他们的信仰系统,尤其是人与动植物精灵的关系。³虽然卡里姆研究工作的重点后来转向社会性别,但她一直都关注原住民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不断有作品发表。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马来西亚的一些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现任马来亚大学人类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朱利·埃多(Juli Edo)是第一个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原住民,他对本族群的口头传统、民族史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原住民的理解。在东马



方面,伊班人出身的人类学家彼得·M·科迪特(Peter M. Kedit)曾任砂拉越博物馆馆长(1991—1996年),他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关于伊班人的现代化和发展问题。他特别强调人类学应该提供更多的应用型研究,提供理解和分析的经验视野,提出解决社会—文化问题的办法。⁴作为政府聘用的民族学家,其观点为大多数后来的研究定下了基调。现任砂拉越比萨亚人协会(Sarawak Bisaya Association)主席安东尼·卡提·加利斯(Antonio Kahti Galis)也研究自己的族群,并且成为本族群利益的发言人和捍卫者。

通常来说,一个相对封闭、文化变迁速度缓慢的社会并不会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产生怀疑,只有当与外部族群的互动增加,且社会—文化变迁加快时,族群的身份认同才会成为问题。因此,近些年来有关族群身份认同问题的人类学研究主要与多元文化主义、伊斯兰化和民族国家的治理有关。例如马来西亚著名人类学家扎瓦维·易卜拉欣(Zawawi Ibrahim)教授⁵以研究大型油棕种植园里的马来雇工起家,⁶后来将研究对象拓宽至东马的少数民族群体,出版了多部著作讨论民族国家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⁷年轻

1 其博士论文是有关塞米莱人的治疗仪式,参见 Hood Salleh., *Semelai Rituals of Curing*, PhD diss., St. Catherine's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1978.

2 Lye Tuck-Po, A History of Orang Asli Studies: Landmarks and Generations, *Kajian Malaysia*, vol.29(Supplement 1), 2011, p.31.

3 Wazir Jahan Karim, *Ma' Betise' Concepts of Living Things*, London: Athlone, 1981.

4 Peter M. Kedit, Current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Sarawak. *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 Vol.23, 1975, p.29-36.

5 全名为 Che Wan Ahmad Zawawi bin Ibrahim, 现在在文莱的大学里任教。

6 Zawawi Ibrahim, *The Malay Labourer: By the Window of Capitalism*, Singapore: ISEAS, 1998.

7 如Z. Ibrahim, *Cultural Contestations: Mediat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Malaysian Society*, ASEAN Academic Press, 1998; Z. Ibrahim (ed.), *Representation, Ident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Sarawak*, Dayak Cultural Foundation, 2008.

的人类学者——马来西亚砂拉越大学的波利娜·巴拉 (Poline Bala) 博士关心的则是国家边界对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¹

3. 社会性别

人类学家中女性多、社会性别研究发达是马来西亚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或许从最早的现代人类学研究开始就露出端倪。当雷蒙·弗思在马来渔村进行田野调查时，他的妻子罗斯玛丽·弗思也同时开展工作，她甚至早于丈夫出版了《马来农民的家务管理》一书。陈志明教授认为雷蒙·弗思的《马来渔民》是马来西亚最早的现代人类学作品，²但如果从出版时间上看，罗斯玛丽·弗思的著作似乎更加名副其实，它也是“东南亚地区最早的妇女研究”。³笔者认为，造成马来西亚社会性别研究发达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都以实行传统的双系继嗣制而闻名，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这一方面使得不少外国人类学家对这里的亲属制度、婚姻家庭结构产生浓厚兴趣，从而离不开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另一方

马来西亚本地人类学家中从事社会性别研究的很多，但影响最大的要数上文提到过的瓦齐尔·贾汉·卡里姆教授。

面也使社会更能够接受女性人类学家的出现。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马来西亚人类学开始起步时，恰逢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进入兴盛阶段，前往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学生和教员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股潮流的影响。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女性主义者历来十分重视对伊斯兰社会中的妇女的研究，相比于南亚和中东各国，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女性地位较高的伊斯兰国家，显然非常值得研究。

马来西亚本地人类学家中从事社会性别研究的很多，但影响最大的要数上文提到过的瓦齐尔·贾汉·卡里姆教授。她及其团队创造性地把马来语中的“妇女”(Wanita)和“儿童”

(Kanak-kanak)这两个词各取一部分，生成了“KANITA”这个词，用来指代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国际项目“发展中的妇女与儿童”。在该项目的基础上，1991年卡里姆在马来西亚理工大学创办了“妇女与人力资源研究部”，它是著名的“妇女发展研究中心”(KANITA)的前身，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也由此进入了马来西亚的各个大学。1992年，卡里姆教授出版了“KANITA”项目的研究成果《妇女与文化：在马来习惯法与伊斯兰教之间》，⁴该书讨论了人类社会双系制的价值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已成为社会性别研究尤其是伊斯兰妇女研究的经典作品。马来亚大学的罗齐娅·奥马尔教授也是一位著述颇丰的马来女人类学家，她从妇女的角度研究社会发展、医疗健康和老龄化等问题，她的代表作包括《身体中的马来妇女：在生物学与文化之间》⁵和《打破边界：马来西亚的妇女》⁶。

华人出身的女人类学家黄俊心 (Cecilia Ng Choon Sim, 音译) 博士同样是当地非常有影响的女性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她的研究涉及社会性

1 Poline Bala, *Changing Borders and Identities in the Kelabit Highlands: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Growing up in a Kelabit Village near the International Border*, Kota Samarahan: Unit Penerbitan Universiti Malaysia Sarawak,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Dayak Studies Contemporary Society Series, No 1., 2002.

2 Tan Chee-Beng, *Anthropology and Indigenization in a Southeast Asian State: Malaysia*, in Shinji Yamashita, Joseph Bosco and Jeremy Seymour Eades (ed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p.308.

3 Victor T. King and William D. Wilder (eds.), *The Modern Anthropolog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263.

4 Wazir Jahan Karim, *Women and Culture: Between Malay Adat and Isla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5 Roziah Omar, *The Malay Women in the Body: Between Biology and Culture*, Kuala Lumpur: Fajar Bakti, 1994.

6 Roziah Omar and Azizah Hamzah (eds.), *Breaking Boundaries: Women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2002.

别、社会发展与就业，特别是全球化和技术变迁对妇女就业的影响，还有马来西亚的妇女运动。她被广泛引用的作品包括《定位马来西亚的妇女：一个工业化国家的阶级与性别》¹、《性别与数字经济》²和《马来西亚的女性主义与妇女运动：未被赞颂的革命》³。马来西亚还活跃着许多华人女人类学家，如王英波博士在研究移民问题里总是特别关注女性，马来西亚砂拉越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丘贞心（Hew Cheng Sim，音译）博士则主要研究砂拉越的少数民族妇女。⁴与中国相比，马来西亚的女性人类学家无疑更加活跃，影响更大。

4. 生态保护

马来西亚是全球12个生物多样性巨丰国家⁵之一，尤其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地、雨林和沿海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对他们的生计影响也最大。直到18、19世纪，一些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的商人、传教士和探险家来到马来亚和婆罗洲时，这里的少数民族都还过着采集—狩猎或游耕的生活，

近些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问题日益引发人们对马来西亚当地雨林砍伐、工业污染和农业商品化的担忧。因此在如何保护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现代技术和新兴产业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的人类学研究增长很快。

至今仍有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例如占马来西亚总人口仅0.7%的原住民却占到贫困总人口的20%。⁶

近些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问题日益引发人们对马来西亚当地雨林砍伐、工业污染和农业商品化的担忧。因此在如何保护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现代技术和新兴产业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的人类学研究增长很快。学者们纷纷检讨过去几十年来政府在少数民族政策和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得

与失，重新反思少数民族传统的生计模式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要贡献，也探索如何帮助这些少数民族尽快摆脱贫困和所受的不公平对待。如现定居澳大利亚的阿尔韦托·G. 戈梅斯（Alberto G. Gomes）针对塞马伊人（Semai）的经济生活和边缘化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⁷马来西亚理工大学的黎德宝（Lye Tuck-Po，音译）是年轻的环境人类学家，她长期关注居住在马来西亚彭亨州森林里的原住民，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知识与地方社区的关系，她的专著《变化着的路：森林退化与马来西亚彭亨州的巴特人》⁸受到了同行的好评。她近期的研究项目包括“森林里的织布者：环境知识传播研究”（2011—2013年），“环境变迁对马来西亚及海外原住民社会的影响”（2011—2012年）等。马来亚大学的卡迈勒·索尔海米·法齐勒（Kamal Solhaimi Fadzil）博士则从2004年起参与了马来西亚政府发起的热带泥炭沼泽林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项目（彭亨州子项目），他同其他学科的专家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 1 Cecilia Ng, *Positioning Women in Malaysia: Class and Gender in an Industrializing Stat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 2 Cecilia Ng and Swasti Mitter(eds), *Gender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Perspectives From the Developing Worl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2005.
- 3 Cecilia Ng, *Maznah Mohamad and Tan benghui, Feminism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in Malaysia: An Unsung (R)evolution*, Oxon: Routledge, 2006.
- 4 Hew Cheng Sim, *Women Workers, Migration and Family in Sarawa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 5 位于或部分位于热带的少数国家拥有全世界最高比例的生物多样性（包括海洋、淡水和陆地中的生物多样性），简称生物多样性巨丰国家。
- 6 Rashvinjeet S. Bedi, 'A Pat on the Back', 2011, <http://thestar.com.my/news/story.asp?file=/2011/11/6/nation/20111106074728&sec=nation>.
- 7 参见 Alberto G. Gomes, *Looking for Mone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in an Orang Asli Village*, Kuala Lumpur: COAC and Melbourne: Trans Pacific Press, 2004, 以及 *Modernity and Malaysia: Setting the Menraq Forest Noma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7.
- 8 Lye Tuck-Po, *Changing Pathways: Forest Degradation and the Batek of Pahang*, Malaysia: Lexington Books, 2004.



如前所述，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往往意味着古老的生计模式的改变，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因此，如何既能帮助少数民族尽快摆脱贫困，又能保护好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成了少数民族自身、国家政府和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人类学家们各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有的站在政府一边，鼓吹加快少数民族的主流化和一体化，特别是那些在马来西亚政府部门就职或受聘于政府的一些学者；有的保持中立态度，不介入、不干预政府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冲突；还有的人类学家则坚决主张要维护少数民族对土地、森林等财产的合法权

益，尊重地方性知识，避免强迫性的文化变迁，他们中有的甚至还为此成立了各种非政府组织，成为激进的社会活动家。如伊夫琳·方 (Evelyne Hong) 已经成为很有影响的反对伐木的社会活动家，年轻一些的科林·尼古拉斯 (Colin Nicholas) 也是一位捍卫原住民利益的活跃分子，现任非政府组织“原住民关怀中心” (the Centre of Orang Asli Concerns)¹ 的协调人。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马来西亚的人类学家不仅生产出了许多直面环境恶化与生态保护问题的作品，而且他们本身已经成了各种环境保护项目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在为政府、

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当地社群提供自己独特的知识贡献。

在上述四大主题中，² 社会发展是最重要、也是最具普遍性的主题，其他几大主题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相关。黎德宝在《原住民研究的历史：里程碑与代际》³ 一文中重点分析了自 1874 年至今研究马来西亚原住民的 204 部作品，指出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在研究兴趣和主题上各有不同。但在过去的 30 年里，新一代的研究者，包括来自原住民社会本身的研究者开展的研究主要是现代化和全球化对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总的来看，对原住民的语言学研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呈下降趋势，但诸如法律、旅游、教育、

1 该组织在原住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声誉，2011 年获得联合国的年度组织奖，Colin Nicholas 作为代表领奖致辞。

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主题并非毫不相干，而是彼此相互交错的关系，也就是说，一项研究可能同时涉及多个主题。本文仅仅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才将一部作品归在某一主题之下。

3 Lye Tuck-Po, A History of Orang Asli studies: Landmarks and Generations, *Kajian Malaysia*, vol.29(Supplement 1), 2011.

伊斯兰化和社会发展变迁等新主题的研究则日渐兴盛。著名美国人类学家、人类学史学家维克多·T. 金 (Victor T. King) 在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婆罗洲的研究时也指出, “如果我们审视过去 20 年来在砂拉越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地区学者的作品, 关注社会—经济变迁和发展议题的占绝大多数, 即使他们最初的研究目标并不是在发展上, 那些移居国外的研究者的作品也一样。”¹ 马来西亚本地人类学家巴哈尔丁则概括说, 人类学在西方国家是“殖民主义之子”, 在马来西亚却是“现代化之子”。²



在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下, 马来西亚政府最终接受了这一提议, 有两名女性于 2010 年被任命为法官。黄俊心博士更是妇女运动积极的参与者和发起者, 她领导组织了“妇女发展共同体”(Women's Development Collective) 和“全妇女行动协会”(All Women's Action Society), 并于 2009 年开始担任新成立的“良好治理与社会性别平等协会”(Good Governance and Gender Equality Society) 的副主席。除此以外, 还有大量人类学者通过各种途径和身份为推动社会性别平等、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原住民利益摇旗呐喊, 奔走助力。

四、评论与讨论

综观马来西亚本土人类学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现它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学科和学者的社会贡献大、国际化程度高, 女人人类学家多、社会性别研究发达, 但同时也存在着地区研究上的不平衡和人类学家当中的族群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人类学作为一门以理解文化、族群、社区见长的社会科学, 在马来西亚的社会科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密不可分。马来西亚是个典型的多元社会, 马、华、印三大族群之间以及“土著”与“非土

著”族群之间有着清晰的界线, 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事业基本上都沿着族群界线展开。促成马来西亚人类学独立成系的直接原因实际上就是 1969 年的种族流血冲突。经过多年发展, 马来西亚的人类学家们已经证明自己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他们不仅创办或参与创办了许多有影响的研究机构, 开辟了大量新的研究领域, 而且亲身参与社会实践, 致力于帮助政府做出正确决策, 推动社会进步。例如, 卡里姆教授致力于推动男女之间在现实中的平等与公正, 1989 年率先组织召开“在马来西亚沙里亚法庭中任命女法官”的专题研讨会,

马来西亚人类学国际化程度高首先表现在学者们的国际化程度高。在人类学系成立之初, 由于需要大批师资, 马来西亚政府出资输送了大批有潜力的学生或教员前往英联邦国家或美国攻读人类学硕士、博士学位, 如今他们在人类学界都占据着领袖地位。至于一些较年轻的本地学者, 虽然陈志明教授批评说由于马来民族主义独尊马来语, 导致他们不习惯于用英文写作和阅读, 妨碍了他们的学术成果的国际化, 降低了学术质量。³ 英语和马来语都是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 该国的学术期刊通常以两种语言出版(同时配有马来文和英文的标题与摘要),

1 Victor T. King, *Borneo Studies: Perspectives from a Jobbing Social Scientist*, *Akademika*, Vol.77, 2009, p.27.

2 A.B. Shamsul, *Antropologi dan Modernisasi Mengungkapkan Pengalaman Malaysia*, Bangi: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1993.

3 Tan Chee-Beng, *Anthropology and Indigenization in a Southeast Asian State: Malaysia*, in Shinji Yamashita, Joseph Bosco and Jeremy Seymour Eades (ed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p.325.

各种学术研讨会也多用英语召开。由于出国留学的选择更加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是在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等国家取得博士学位，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仅限于英国和美国的几所大学，留学的层次也从硕士、博士扩展到本科和博士后研究阶段，这些变化必然给马来西亚的人类学界带来更丰富的养分，提高国际化程度。

国际化程度高的表现还在于学者们的地区视野和全球眼光。马来西亚的人类学家通常不会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国内的某个社群，而是积极寻找机会开展海外研究。一般来说，马来人类学者会利用自己的族群身份和宗教身份，同时研究印尼和东南亚地区的马来人，或者研究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华人人类学家则研究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包括中国、美国等地的华人；还有不少学者已经在近的周边国家和远的非洲、欧洲、北美洲等地开展过田野调查并撰写民族志。¹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马来西亚的人类学研究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是地区研究上的不平衡。就马来西亚本土生产的人类学知识成果来看，西马人类学显然要比东马发达得多。但随着东马两所大学的设立，这道鸿沟已经处在弥合当中。第二种不平衡就是人类学家当中的族群发展

虽然马来西亚在人口、地域等方面都属小国，但由于该国在族群、语言、宗教信仰、生计模式等方面都具有十分丰富的多样性，历来是各国人类学家开展田野调查以探索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理想舞台，在人类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平衡。目前，马来人类学家在学界占据绝对优势，这可以很容易地从各所大学人类学系的师资上看出。虽然具有华人、印度人以及各少数民族背景的人类学家数量有所增加，但如果继续像陈志明教授所说的：“华人或印度人出身的人类学家很难在学术机构找到职位”²的话，就会很不利于非马来族的马来西亚人成为职业人类学家，或者可能导致大量人才外流。事实上，黎德宝已经指出，马来西亚学者研究队伍的扩充太慢，在过去15年来，只出炉了6部新的专门研究原住民的博士论文。³另外，随着社会转型的完成和其他几门社会科学的成长成熟，马来西亚本土人类学也面临着自身的发展危机。具体而言，今后的挑战包括：

人类学如何在跨学科研究增多，学科界线日渐模糊的时代背景下保持学科的独特性和合法性，如何在实证性的定量研究方法倍受青睐的趋势下证明和彰显民族志研究方法的的优势，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准确定位马来西亚本土人类学的意义及其特色，如何在学科内部突破僵化的族群界线，促进不同族群的人类学家之间的对话。

虽然马来西亚在人口、地域等方面都属小国，但由于该国在族群、语言、宗教信仰、生计模式等方面都具有十分丰富的多样性，历来是各国人类学家开展田野调查以探索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理想舞台，在人类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考察马来西亚本土人类学的发展轨迹，不仅有助于我们思考同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本土人类学的过去和未来，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世界人类学的过去和未来。马来西亚的人类学鼓励和促进跨学科研究，始终关注国家或社群利益，既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们理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变迁的可能性提供了有效途径。马来西亚的人类学家更加国际化，更具有流动性，也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影响公共舆论的能力，这些都很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1 康敏：《民族志书写——中国人认识海外社会的突破口》，载《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第34—44页。

2 Tan Chee-Beng, *Anthropology and Indigenization in a Southeast Asian State: Malaysia*, in Shinji Yamashita, Joseph Bosco and Jeremy Seymour Eades (ed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p.317.

3 Lye Tuck-Po, *A History of Orang Asli Studies: Landmarks and Generations*, *Kajian Malaysia*, vol.29(Supplement 1), 2011, p.23.



中国与加拿大的能源合作 ——基于中国能源安全视角¹

董宜坤 /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摘要

随着中国的发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能源安全成为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加拿大蕴藏着丰富的能源资源，是 21 世纪能源新轴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同加拿大的能源合作，对缓解我国能源紧张、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文从能源安全的视角，探讨中加能源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¹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中国与加拿大的能源合作——基于中国能源安全视角》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能源安全的现状

30 年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日益高涨，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性日益突出。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的能源消费国以及净进口国，每年进口大量的能源。2000—2009 年间，中国能源需求在全球的比重从 11% 增长到 19%，预计 2035 年达到 23%。¹

以石油进口为例，2012 年，中国石油消费量近 5 亿吨，原油净进口约 2.7 亿吨，中国约 55% 的原油依靠进口。预计在 2020 年前后，中国石油进口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净进口国。BP 石油 2012 年公布的《2030 世界能源展望》预测，2030 年，中国对外能源依存度将高达 80%，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从中长期看，自身能源生产已经无法满足国内产能的需求，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这就要求中国扩大国际石油合作，保证石油安全保障程度。

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也在持续增长，2012 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约为 1471 亿立方米，国内生产量为 1046 亿立方米，缺口为 425 亿立方米。到 2020 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预计达 4500 亿立方米，届时我国天然气自产量仅能满足一半的消费量，另一半只能通过管道或者液化气的形式从国外进口。

我国能源资源储备虽然丰富，但

可见中国面临的能源问题十分严峻，能源已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战略性问题。因此，中国迫切需要推进海外能源合作，建立稳定多元的海外能源供应体系。在现有能源进口来源的基础上，开拓加拿大能源市场，开展与加拿大的能源合作，增加从加拿大的能源进口量，进而保证中国能源安全供应。

从人均能源拥有量角度来看，却是一个能源资源匮乏的国家。中国人口众多，约占世界人口的 1/5。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处于较低水平。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15 左右。截止 2011 年底，中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占世界的 0.9%、天然气占 1.5%。我国不但油气资源贫乏，而且人均煤炭资源也不丰富。我国已探明的煤炭储量仅占世界的 13.3%。²此外，我国能源资源分布不均衡，开发难度较大，能源质量低，优质能源缺乏，能源储量结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等，这些制约因素使中国长期处于能源缺乏状态。

可见中国面临的能源问题十分严峻，能源已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战略性问题。因此，中国迫切需要推进海外能源合作，建立稳定多元的海外能源供应体系。在现有能源进口来源的基础上，开拓加拿大能源市场，开展与加拿大的能源合作，增加从加拿大的能源进口量，进而保证中国能源安全供应。

二、与加拿大能源合作的意义

1. 中国与加拿大开展能源合作，为中国未来能源需求拓展更为稳定的来源地。

加拿大能源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油气资源。石油探明储量达 1788 亿桶，约占世界探明储量的 13%。根据加拿大国家能源署 2011 年提供的数据，加拿大 2010 年原油储量采储比为 165 年，探明储量为 1728 亿桶。据此估算，加拿大石油产量有望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在可预见的未来，加拿大依旧是重要的石油出口国。加拿大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达到 1.81 万亿立方米，非常规天然气蕴藏量 11.1 万亿立方米，是仅次于美国与俄罗斯的世界第三大天然气生产国，也是第三大净出口国。

作为世界十大能源生产国之一，加拿大能源生产总量一直高于其国内消费总量。随着新技术和创新手段

1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2011, IEA, p81.

2 BP Statistical Review, 2012.

的应用,包括阿尔伯塔北部的 grand rapids 地层以及萨斯喀彻温西北部油砂资源的开发,油砂开发深入到新地层与区域。近年来,随着国际油价不断走高,加拿大石油探明储量增加,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特别是油砂等非常规石油生产能力得到较快发展。而与此同时,加拿大经济增速放缓,国内能源消费能力下降。因此,产量的提高,国内能源消费增速放缓,为加拿大扩大能源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2010年加拿大能源出口占到总出口的23.2%。

21世纪能源格局正发生着变化,非常规油气资源得到迅猛发展。原油供应中心已从中东欧佩克的沙特阿拉伯,扩展到里海,横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最终延伸到加拿大。这条21世纪世界能源新轴心,将成为能源地缘政治的重要驱动力量。2011年加拿大油砂油的产量为150万桶/日,比利比亚战前的总出口能力还要多。据预测,加拿大油砂油的产量到2020年有望翻倍,达到300万桶/日,仅油砂油的增量就足以使加拿大成为世界第五大产油国。加拿大是具有很强的生产能力的能源输出国,又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规范的市场体系。无论从扩大中国海外油气进口市场来说,还是从中国进口能源的多元化战略来说,加拿大都是中国未来能源需求重要又现实的供应伙伴国。

2. 从中国石油进口安全角度出发,与加拿大的能源合作,是中国突破能

21世纪能源格局正发生着变化,非常规油气资源得到迅猛发展。原油供应中心已从中东欧佩克的沙特阿拉伯,扩展到里海,横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最终延伸到加拿大。这条21世纪世界能源新轴心,将成为能源地缘政治的重要驱动力量。

源运输瓶颈,建立多元化石油运输网络的有效路径之一。

近年来,中国石油进口趋于多元化,进口地来自中东、非洲、亚太、拉美等地区。但中国原油进口量近80%都是依赖中东与非洲地区。2011年,中国进口石油的51%来自中东,24%来自非洲。整个石油运输系统,90%的石油依赖海上运输。而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大型油轮海运路线较为单一,80%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而这一重要的海上通道历来是各国必争之地。美国在新加坡的樟宜基地、印度洋中北部的迪戈加西亚基地以及菲律宾海空军基地与马六甲海峡遥相呼应,使得其军事威慑力覆盖整个印度洋和马六甲地区。中国海空军实力相对薄弱,无法在这一石油运输通道上形成有效的军事威慑力。因此,中国石油进口运输的安全随时面临着其他国家的威胁。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中国

明确要建立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可控的海上运输通道。相较于途径马六甲海峡进口中东、非洲的石油,加拿大的油气更具备运输安全性与供应稳定性优势。来自加拿大的油气经过太平洋,无须经过马六甲海峡,中加两国的海运距离也近于运自中东的石油。

三、中加能源合作的现状

中加能源合作的历史不长,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两国政府对能源合作已进行意向性的接触,但实质性的合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合作的重点主要在石油、天然气、天然铀以及能源技术方面。能源产品贸易方面,中国能源产品需求与加拿大的能源产品供应匹配性很高,但贸易量一直很小,多以石油贸易与铀贸易为主。中国从2003年开始从加拿大进口石油。但加拿大从2003年到2011年的9年间对中国石油出口量仅有212万吨;2012年对中国的出口量相较2010年虽翻了近一番,但仍只占同期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2%。

铀贸易是另一个持续增长的领域。1996年11月加拿大原子能有限公司与浙江秦山核电公司签订合同,为秦山三期核电站供应天然铀。2010年6月中国广东核电与卡梅科公司签署协议,将在2025年前向中广核供应2900万磅的铀精矿。虽然两国铀贸易规模目前较为有限,但中国国内已探明的铀矿资源不足以支撑核能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所以中加合作前景很广阔。



能源投资合作方面，中国对加拿大的能源投资起步较晚。1993年中石油获得加拿大北湍宁油田的部分股权，标志着中国石油公司进入加拿大能源市场。在1993年至2009年间，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以资源开发型投资为主，参与者主要是国有三大石油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海油，投资的资产多为加拿大在境外的能源资产。

2005年4月，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收购了MEG能源公司近17%的股份。同年5月，中国石化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加石油公司与加拿大西年科(Synenco)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开发位于阿尔伯达省的北极之光油砂项目。2006年10月，中国石油集团与总部设在阿尔伯达省的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Petro Kazakhstan, 简称PK公司)达成收购协议。2008年中石化出资20亿美元收购加拿大

噶尼喀(Tanganyika)石油公司，该公司主要的资产在叙利亚，日产石油为1.6万桶。2009年中国投资集团对南戈壁能源有限公司(South Gobi Energy Resources)投资5亿美元，开发其在蒙古的煤矿项目。2010年，中石油与萨斯喀彻温省签订合作备忘录，在油砂、页岩气开采等方面开展合作。2010年中石化出资46.5亿美元购买美国康菲石油公司拥有的加拿大辛克鲁德(Syncrude)公司9%的股份，成为当时亚洲国家在北美数额最大的一笔投资。2011年10月中石化出资22亿加元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Daylight)公司。同年7月，中海油出资21亿美元收购油砂企业OPTI。2012年1月中石油以24.73亿美元买断阿萨巴斯卡油砂公司(Mackay River & Dover)油砂项目的股份，这标志中石油在海外非常规能源收购领域迈出了标志性一步。

政府对话机制方面，从中加两国政府合作层面看，2001年时任加拿大总理的克里蒂安在访华期间表示，两国就能源及相关领域合作达成备忘并签署了相关协议。2003年温家宝总理出访加拿大期间，明确能源应成为双边合作的重点之一。这两次高层访问推动中国到加拿大进行大量投资进入了准备实施阶段。

2005年1月中加两国签署《21世纪能源合作声明》，能源合作获得实质性突破。《声明》确认，双方合作的优先领域包括石油、天然气、核能、能效、清洁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双方将在遵守两国相关法律法规、推动长期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2006年到2009年，由于加方的原因，双边能源合作一度出现停滞。史蒂芬·哈珀2009年12月第一次访华推动了两国能源合作重回前进的轨道，哈珀与胡锦涛主席联合发布《加中联合声明》，宣布加强副部长级战略工作组的作用，能源成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在2010年胡锦涛访问加拿大时，再次强调了战略伙伴关系，以及能源合作这一战略重点。2012年哈珀访华，两国一致同意扩大在油气、核能、可再生能源、林产品、矿产等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领域的合作。

四、面临的障碍与问题

中国与加拿大的能源合作稳中有升。但能源是特殊商品，不同于一般大宗贸易品，能源买卖不是简单的市



场行为，而是关乎国家安全，是具有很强政治性的商品，是各国竞争的焦点。因此能源始终受到国内因素以及各种国际关系的影响，其中大国关系的角力尤其值得关注。中加能源合作如果想进一步深化，面临着来自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印度这些大国的竞争。几大国的角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国与加拿大的能源合作。

1. 美国因素

美国是加拿大能源的传统出口地，是加拿大第一大能源出口市场。加拿大在能源经济上对美国依赖度很高。2011年有76%的油气出口美国。到2030年，预计美国日石油消费的1/4还将来自加拿大。

美加两国有着密切的能源贸易关系。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美国和加拿大是邻国，地理位置的毗邻使两国具备合作优势；另一方面，两国意识形

态与文化相近，政治经济交往密切。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已逾百年，关系密切。1987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能源协议的达成，使美国有保证地获取加拿大的能源供应。协定的第九章规定，双方保证将在双边能源贸易中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双方都不对双边能源进出口贸易进行任何形式的数量或价格的限制。也就是说，只有在能源枯竭、为了保持国内储备或因受到军事威胁、涉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对能源出口实施数量限制。但在实施这种限制时，实行限制一方必须保证对方能获得过去36个月内其在本国能源供应中所占有的份额的能源供应等。协定在机制上深化了两国的能源贸易关系，也紧密绑定了两国的能源合作。

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加两国均对本国的油气行业放松管制。能源

行业的私有化浪潮把国家对能源贸易的干预降到最低，这保证了市场在两国资源流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推动美加油气在开发、生产、运输以及营销等各个环节一体化进一步加深。进入21世纪，加拿大在美国的能源安全版图中依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部长丽莎·瑞特(Lisa Raitt)所说：“加拿大油砂是美国能源安全极其重要的一个组分。如果不从加拿大买(石油)，你还能从哪里买呢？如此一来，(美国)只会加深对欧佩克国家能源的依赖性。”¹美国47%的原油进口来自欧佩克国家，而来自加拿大的石油占到美国从非欧佩克国家进口石油比例的47%。美国在致力减少对中东以及其他政局动荡地区的石油的依赖同时，确保亲密盟友加拿大对其稳定的石油供应是十分必要的。

1 "Canada Oil Sands Help U.S. Energy Security", Reuters, Oct 12, 2009.

2006年,为了弥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加双边能源贸易合作指导性不强这一缺陷,美国与加拿大构建“安全与繁荣伙伴关系”,建立能源工作小组,旨在密切两国能源合作交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并发展能源贸易。作为对“安全与繁荣伙伴关系”的延续,2009年,美加达成“超越边界”协议(Beyond the Border),旨在“进一步扩大双边能源贸易”,为扩大稳定渠道获取能源提供机制保证。

自2007年美国能源革命以来,美国石油产量的上升以及提高能源效率政策的执行,美国对外能源依赖有所下降,但加拿大在美国的能源安全版图中依旧扮演重要的角色。虽然奥巴马主导的美国政府决心要通过多种途径减少海外石油的进口量,但其所指的“海外石油”并不包括加拿大这个“稳定”而“可靠”的石油贸易伙伴。为了保证从加拿大的油气供给,美国大力发展与加拿大的油气管道建设。拱心石二期管道项目(Keystone XL Pipeline Project)虽在美国国内引发很大争议,被暂时搁置,但当时业界普遍认为,该项目将在奥巴马连任后获得通过。此外,美国也密切了与加拿大在北极地区的能源合作,联合建设北极地区天然气管道网络。自2008年以来,已有三条天然气管道在合作建设中,¹管道建成后,将源源不断地

加拿大能源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重要性在于其潜在的资源优势与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与加拿大的能源合作起步较晚,但近十年来,中国实施“能源走出去”战略以来,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向美国本土的48个州输送北极丰富的天然气。

2. 俄罗斯

俄罗斯是油气资源大国。俄加能源合作起步较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2006年曾拟与加拿大石油公司(Petro-Canada)合作,在魁北克省建设液化天然气再气化工厂,将圣彼得堡的液化天然气运到魁北克,再分拨到加拿大国内与美国。但由于俄政府漫长的审批程序与北美页岩气革命的发生,该计划最终被搁置。2008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参与加拿大Rabaska液化天然气项目的投资,这是俄首次在加拿大投资液化天然气,作为Rabaska项目的重要伙伴,此举标志了俄罗斯挺进加拿大能源市场。近一两年,俄罗斯加强了与加拿大的能源合作。加俄两国认

为,能源合作是“最有发展前途”的合作领域,以能源合作深化与加拿大的经贸关系,并支持俄罗斯的能源企业加大对加拿大的投资。2012年,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收购了加拿大埃尔伯特省Cardium页岩探区30%的权益。这标志着俄罗斯石油公司获得北美能源以及开采难以生产的石油储备专业知识与技术的开始。

对俄罗斯而言,不论是经济利益还是能源安全诉求,进入加拿大能源市场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俄罗斯在加拿大存在能源安全的利益诉求,《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提出“突破北美、稳定西欧、争夺里海、开拓东方、挑战欧佩克”的能源外交总体路线。在经济利益上,俄罗斯加强与加拿大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正如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世界油气市场分析师安德鲁·波特预计的那样,由于俄政府出台了新税收政策鼓励俄企业投资海外,未来将有更多的俄能源企业投资加拿大。“鉴于蜂拥而至的亚洲各投资国,俄罗斯的加入将加剧各国将加拿大能源作为战略资产的争夺。”²

3. 日本因素

作为一个能源稀缺的国家,日本所需的约80%能源均依赖进口。日本大约90%的石油供应来自中东地区,动荡的中东局势以及中东国家对外来能源投资政策的多变性,都会影响日

1 三条线路分别是横加公司(Trans Canada)和埃克森美孚石油合作建设阿拉斯加天然气输送系统,德纳利(Denali)天然气管道系统以及麦肯基(Mackenzie)天然气管道系统。

2 Russians Follow Chinese Into Oil Patch, Financial Post, April 17, 2012.

本能源安全。以石油运输渠道的安全为例，中东的石油运往日本要通过两个敏感的咽喉要道——马六甲海峡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为了分散地缘政治的风险，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日本通过投资能源项目、开展经济合作等手段，努力拓展与加拿大、俄罗斯、非洲以及拉美等能源供给国的关系。日本与加拿大在诸如煤、核能、油气以及其他替代能源等多种能源领域都有着紧密地合作。在 2008 年至 2012 年间，日本是亚洲诸国在加拿大能源领域的最大投资国。同期，日本在加拿大能源投资额高达 520 亿美金。

日本 2011 年的地震与核泄漏事故使日本政府意识到能源安全性的重要性，以及来自友好国家稳定供应的重要性。加拿大因此成为日本寻求能源的一个新的潜在伙伴。日本 2012 年 3 月正式启动与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就日本而言，谈判的一大驱动力是对加拿大丰富的能源资源的需求。自由贸易协定一旦达成，将有利于两国在能源安全领域进行更深入的合作。¹

4. 印度因素

印度近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印度国内石油资源匮乏，其 70% 的能源依赖进口。为了支持近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印度对石油需求约以年均 4% 的增幅增长。

我国应加强对加拿大投资的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的跟踪研究，详细了解加拿大的整体战略调整、经济政策法规新动向以及国际因素对加拿大能源战略走向的影响，从而为长期合作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为了确保能源安全，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印度制定了一个全面拓展海外能源的计划。积极拓展与中东、北非、中亚的外交与经济关系，确保油气资源的供应安全。2003 年，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出资 11.3 亿美元买下加拿大 (Talisman) 能源公司在苏丹的资产，自此印度开始了与加拿大能源的合作。近两年，印度把能源扩张的触角伸向北美地区：一方面努力游说美国放松页岩气出口限制；另一方面在加拿大加快油气资源的购买。印度外交部有关人士肯定了加拿大在印度寻求海外能源供应新版图中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更关注加拿大。它将是印度能源与矿产的一个重要来源。”²

2012 年 10 月哈珀访问印度期间，宣布要在三年内力争使双边贸易额翻三番，达到 150 亿美元。实现这

一目标的三大重点之一就是发展双边能源贸易。印度正与加拿大进行“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的谈判，届时印度将得以扩大能源贸易与投资，构建稳定的能源通道获取能源，最终会直接或间接地消减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五、对策

加拿大能源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重要性在于其潜在的资源优势与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与加拿大的能源合作起步较晚，但近十年来，中国实施“能源走出去”战略以来，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随着非常规油气资源逐渐形成规模，双方密切了合作关系，加拿大有条件成为中国未来油气资源进口的重要战略后备来源，应该成为我国能源外交需要重视的一个国家。从能源安全的视角，结合中国与加拿大能源合作的目标，提出中加能源合作的对策。

第一，要把能源合作政策与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紧密联系，加强中加政府间的沟通与协商，制定切实可行的长期合作战略。“放眼长远大局，实现互信共赢”应成为两国能源合作的重要原则。目前两国能源合作水平不高，而经贸关系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制约能源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1 "Japanese Taste For Canadian Energy Cited In Trade Talks", *Embassy*, Sneh Duggal, May 23, 2012.

2 India, "Canada Push For Energy Tie-ups", *The Hindu*, July 2, 2012.



两国政治关系基础不够稳固，时有波折。双边政治互信与相互认知有待进一步加强。能源属于战略性资源，政府在能源合作中发挥主导或重要作用，政治关系的稳固是国家间能源合作的基础。从政府合作层面看，没有在战略伙伴关系中把能源问题当作真正的战略重点。我国应充分利用与加拿大总理、各省省长的会晤机制、战略工作组的会议机制，协调解决与加拿大能源开发中的各种问题，探索资源开发合作项目，同时应加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领馆对企业的服务功能。能源合作长远发展是基于两国共同制定的双赢的长期合作战略上，从而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推进合作。

另外，我国应加强对加拿大投资的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的跟踪研究，详尽了解加拿大的整体战略调整、经济政策法规新动向以及国际因素对加

拿大能源战略走向的影响，从而为长期合作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第二，积极参与加拿大能源开发合作，合作形式多样化。能源贸易的互补性并不足以保证加拿大的油源供应。要全面参与到资源的上中下游产业中去，只有在油气勘探、生产、提炼以及相关油气化等领域全面合作，才能使加拿大的油气供应的安全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第三，中国应在中加美三边关系的大框架里发展中加能源合作。

美国对中加能源合作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战略层面上。加拿大作为美国的盟友，也是美国最主要的能源进口来源，从地缘政治以及石油储量上都满足美国的需求。中国在加拿大开拓能源资源，有可能引发中美在能源地缘政治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来自安全领域，而非经济利益的竞争。

加拿大的能源多元化战略只是稍稍平衡与中、美的关系和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其战略中心仍是美国。因此在中国与加拿大开展能源合作中，考虑到美国的重要性，无论对中国能源安全是挑战还是机遇，都应积极加强与美国的协调合作。中美之间在政府合作层面，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建构基础的战略互信。协作要考虑两大问题：一是在油源获取方面，可以通过入股的方式，聚集合作伙伴优势，通过集合投资，获得稳定的持续的能源供应。二是在能源运输安全方面，尝试与美国合作。例如，规划中的北方门户输油管道项目建成之前，中国在加拿大的油气项目中的份额油可能需要先输往美国。在管道路线上，美国西海岸各州与中国有共同的利益。可联合协商开发。

第四，与东亚资源短缺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地缘优势与经济发展优势，联合亚洲各国共同开拓加拿大的能源市场。可借鉴北美与欧洲能源合作经验，建立东亚能源合作的共同体，在能源安全层面塑造一定合作构架，形成购买油气资源联盟，在能源运输上互相提供便利，降低运输成本，形成更广泛的利益关联。从长远上看，东亚各国在加拿大的共同性能源利益被挖掘的越充分，该区域内过度竞争的可能性就越小，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



对亚洲几国中央银行资本金的观察和比较研究¹

任康钰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摘要

本文就中央银行资本金指标，对亚洲几国在这个指标上的规定、表现等进行观察和比较研究。文章首先选取了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印度五国作为目标国，然后具体对他们的中央银行资本金进行观察，接着再结合目标国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表现等对其进行分析，最后就亚洲几国央行资本金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中国能够获得的启示。

关键词

中央银行 资本金 亚洲国家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对亚洲几国中央银行资本金的观察和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

一、目标国的选择及其央行资本金观察

对于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而言，资本金的所有者是银行经营获取利润的最终指向；同时，资本金也发挥着缓冲损失的作用。因此，资本金是管理和监管都非常关注的部分。在此，我们选取亚洲的一些国家进行中央银行资本金研究，一方面可以对资本金有更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我国在央行资本金管理上提供一些参考。

亚洲的国家（地区）众多，因此必须有所选择，才会使研究更有效率并得到较有意义的结果。中国作为比较研究的核心，自然是要在观察范围之内。除了中国，本研究还选择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印度等四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理由分别如下。

日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亚洲发展程度最高的经济体；¹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其宏观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举足

对于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而言，资本金的所有者是银行经营获取利润的最终指向；同时，资本金也发挥着缓冲损失的作用。因此，资本金是管理和监管都非常关注的部分。

轻重的作用。韩国是东亚地区新兴经济体（Emerging Market）的代表，²过去一直有较好的经济表现，对它的中央银行进行观察也就显得不可或缺。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城市小国，但在金融管理上有自身独特的经验，对其央行资本金的观察也十分必要。最后，作为一个同中国类似的人口大国，也是南亚地区的最大经济体，印度往往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亚洲国家。而且，近年来关于中国和印度的各种比较也

是层出不穷。那么，在中央银行的资本金上，印度有什么规定和表现，也值得我们进行观察和研究。

在确定了五个目标国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具体对这些国家中央银行的资本金进行观察。

首先来看中国。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其全部资本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³第一章第8条规定由国家出资，属于国家所有。该法第39条则规定，央行每一会计年度的收入减除该年度支出，并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核定的比例提取总储备金后的净利润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央行的亏损则由中央财政拨款弥补。从近年来的数据看（见表1），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本金在2002年之前略有变化，之后就维持在219.75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上；与此同时，央行的总资产规模则从5万多亿元不断增加到近29万亿元，因此资本金占总资产的比重微乎其微、不断减少。

表1 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资本金与总资产规模（单位：亿元人民币）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自有资本 A: Own Capital	219.75	219.75	219.75	219.75	219.75	219.75	219.75	219.75	219.75	219.75	219.75
总资产 B: Total Assets	51107.58	62004.06	78655.33	103676.01	128574.69	169139.80	207095.99	227535.02	259274.89	280977.60	289657.75
占比A/B	0.430%	0.354%	0.279%	0.212%	0.171%	0.130%	0.106%	0.097%	0.085%	0.078%	0.076%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统计数据 www.pbc.gov.cn；2012年的数据是截止到9月底的数据，其他年份则是到年底的数据。）

1 2010年第2季度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 现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中，已经将韩国列入了工业化国家之中。

3 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根据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决定》修正。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资本金 A: Capital	1	1	1	1	1	1	1	1	1	1	1
总资产 B: Total Assets	1251263	1313685	1445467	1556071	1155436	1112844	1227708	1225336	1287104	1430219	1537316
占比A/B	0.000080%	0.000076%	0.000069%	0.000064%	0.000087%	0.000090%	0.000081%	0.000082%	0.000078%	0.000070%	0.000065%

(数据来源: 日本银行网站统计数据 www.pbc.gov.cn; 2012 年的数据是截至 10 月底的数据, 其他年份则是到年底的数据。)

日本银行 (Bank of Japan) 是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法》对其资本金相关方面做出了规定。第 8 条中规定, 日本银行的设定资本为 1 亿日元, 由政府 and 私人部门共同出资, 但政府的贡献不能小于 5 千 5 百万日元 (即 55%)。当然, 私人部门的出资并不能代表他们能够参与央行的管理, 只是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和红利分配权。从规模上看, 日本银行的总资产规模相对更大, 资本占总资产比值也就更为微小。(见表 2)

新加坡的中央银行是新加坡货币管理局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在有关法案中对其资本金的规定是: 货币当局的缴清资本金为 1 亿新加坡元; 该资本金还可以随时以政府同意的金额增加; 资本金的增加可以通过转移一般储备基金 (the General Reserve Fund) 或其他政府认同的方法实现。观察近年来的统计数据 (见表 3), 新加坡央行的资本金在 2009 年度有一次大的增加, 一下从原来的 1 亿元增加到 170 亿元; 到了 2012 年度 (3 月 31 日之前) 又增加到 250 亿。

表 3 新加坡货币管理局的资本资产状况 (单位: 亿新加坡元)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资本金 A: Issued and Paid-up Capital	1	170	170	170	250
总资产 B: Total Assets	2537.88	2647.51	2858.98	2997.51	3192.00
占比A/B	0.04%	6.42%	5.95%	5.67%	7.83%

(数据来源: 新加坡货币管理局网站统计数据 www.mas.gov.sg; 每一年的数据是截至 3 月底的数据。)

表 4 印度储备银行 2011—2012 会计年度资产负债表 (单位: 亿卢比)

印度储备银行			
发行部门 (Issue Department)		银行部门 (Banking Department)	
资产	负债	资产	负债
金币和金条 7600.96	钞票发行 110347.34	钞票和硬币 0.89	资本 0.5
外国证券 102619.67		外部资产 36402.73	储备基金 650.00
卢比硬币 22.07		投资 63058.97	信用安排 21.60
政府证券 104.64		贷款 2058.53	存款 37236.84
总额: 110347.34	总额: 110347.34	其他资产 9026.00	其他负债 72638.18
		总额: 110547.12	总额: 110547.12

(数据来源: 印度储备银行网站年报中的数据 www.rbi.gov.in。)

韩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上述中央银行的资本金规模虽然相对很小, 但总还存在。韩国的中央银行韩国银行 (The Bank of Korea) 则根据韩国的中央银行法第 2 条规定, 作为一个特殊的法人 (Juridical Person), 没有资本金; 第 100 条就其损失处理进行了规定: 任何财政年度里韩国银行出

现的损失都由其储备 (Reserves) 来抵消; 如果该储备不足, 则不足部分由政府补充。

印度的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 (Reserve Bank of India) 建于 1935 年, 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货币和金融稳定。关于其中央银行的法律文件《印度储备银行法》(Reserve Bank of



India Act) 在 1934 年颁布, 其中对资本金做出规定: 第 4 条中规定该银行的资本金为 5 千万卢比 (Five Crores of Rupees); 第 46 条则规定中央政府要向央行转移这笔资金。与之相对应, 伴随着 1949 年央行的国有化, 印度储备银行完全由印度政府所有。另外, 第 47 条中规定了关于央行运行中利润的去向: 利润都支付给中央政府。而曾经规定资本金增减的第 5 条款在该法 1948 年修正时被废除了。

从法律上的规定来看, 印度中央银行的资本金是一个固定的金额, 不随其资产规模的扩大而变化。当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时, 资本金占资产规模的比重会不断变小。另外, 它的资产负债表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其他央行的

特征。印度央行下分为发行部门和银行部门, 并有各自相对应的资产负债表。在发行部门 (Issue Department) 下, 负债由流通中的通货构成,¹ 资产则相应是央行持有的金币、外国证券、卢比硬币、印度政府证券等。可见, 发行部门与资本金没有关系。在银行部门 (Banking Department) 下, 负债包括来自政府、州政府、商业银行等机构的存款 (Deposits)、其他负债 (Other Liabilities) 和资本金等项目。

我们对最新的《2012 年年报》统计的 2011-2012 会计年度 (7 月—6 月) 做一个简单观察可以看出 (见表 4) 在经过多年积累之后, 资本金占印度央行总资产的规模已经微乎其微。

二、目标国相关指标的观察

通过上一部分的观察可以看到, 五个国家在中央银行资本金的规定和表现上各不相同, 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在具体进行有关资本金的比较研究之前, 我们再来看一下几个与央行相关的指标。有了一定的背景, 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分析有关中央银行资本金的一些问题。

中央银行作为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 承担着执行货币政策的任务。因此, 这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法中都具体规定了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见表 5)

从货币政策目标上看, 各国基本上不存在差异, 都特别强调物价稳定这一目标, 这也是理论上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最应该保证的目标。

1 除了流通中的通货, 还有极少部分 (不足 0.0001%) 是由央行的银行部门持有的通货。

既然物价稳定是中央银行最基本的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就观察一下这些国家近年来在物价水平上的状况。

从图1给出的近二十多年来的五国物价水平来看，五个国家除了个别年份有异常的通货膨胀表现外，总的来讲表现还是比较平稳的；几个较为异常的通货膨胀表现，与该经济体所经历的经济转型等有关，如中国1993年前后的表现。各国存在的通货膨胀差异，一方面源于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的选择和执行，另一方面也与每个经济体面对的具体宏观经济环境有关。如果专门看资本金规模与货币政策在物价水平上的表现，两者并不存在变动上的相关关系。不过，从五国通货膨胀的表现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各国资本金的状况并没有成为妨碍其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因素。

尽管央行资本金看上去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对于很多中央银行而言，能够发挥类似于商业机构资本金的损失补偿作用的资金其实并不仅限于其资本金，往往还有储备基金(Reserve Fund)。这是我们理解央行、观察央行资本金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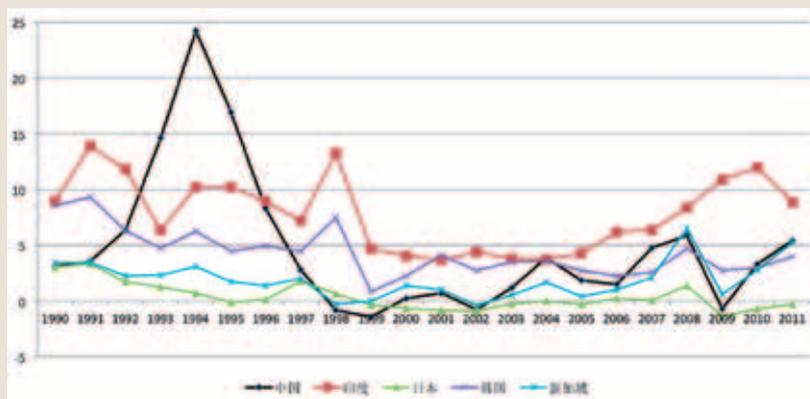
首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第3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每一会计年度的收入减除该年度支出，并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核定的比例提取总准备金后的净利润，全部上缴中

表5 几国中央银行的目标

国家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来自各自的央行法）
中国	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第3条）
日本	目标是获得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第2条）
新加坡	保持物价稳定，使其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第4条：1、a）
韩国	通过保持物价稳定来贡献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第1条）
印度	保证物价稳定，为经济中的生产部门提供充足的信用流来支持经济发展，获得金融稳定。（摘自印度央行文件“Reserve Bank of India: Functions and Working”第22页。）

（资料来源：几国中央银行网站上提供的中央银行法的文本。）

图1 几国近年来的物价变化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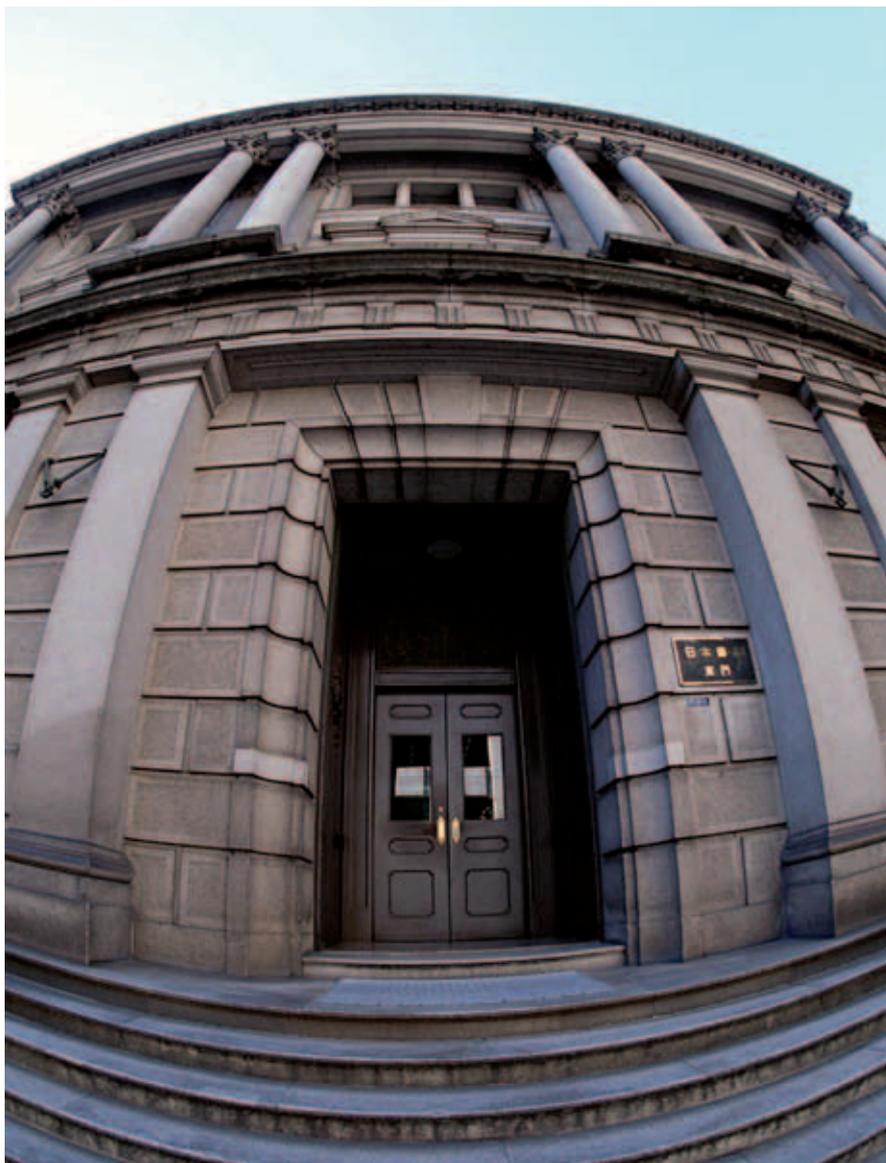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金融统计（IFS）中对各国CPI指数的统计数据（CPI % Chg. over corresponding period of previous year）。

央财政”。其中提到了“总准备金”。几个负债项目中看，这一项目可能是被因此，即便是人民银行的资本金较为固定，但总准备金却随着央行每年运营获得利润而得到积累。不过，人民银行对外公布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单列出“总准备金”这个项目。从已有的

几个负债项目中看，这一项目可能是被归入到“其他负债”项下。¹从规模上看，这个项目要远远大于资本金，前者是后者的20倍以上。

日本在其中央银行法案中第53条规定了储备基金(Reserve Fund)的运

1 中国人民银行给出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项目包括：储备货币，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发行债券，国外负债，政府存款，自有资金，其他负债。因此，能够包括总准备金的项目只可能是“其他负债”。



行,每年净利润的5%都进入储备基金;而且,在特别需要的情况下,还可以超过这一数额;储备基金不能被央行转移或当作红利进行分配;不过储备基金可以用来弥补央行运行中出现的损失。观察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其净资产中既包括固定的资本金项目,还包

括储备金,分为法定储备(Legal Reserve)和特别储备(Special Reserve),其中法定储备占比在99.99%以上。以2011财政年度的数据来观察,法定储备的规模是资本金的26861.7倍,占总资产的比重约为2%。除了储备金外,日本银行在其一般负债中还有两

项拨备,分别是用来防范债券交易损失(Provision for Possible Losses on Bonds Transactions)和外汇交易损失(Provision for Possible Losses on 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s)的。它们也相当可观。在2011财政年度里,这两项之和超过3万亿日元,是法定储备的1.13倍。

新加坡的中央银行法案(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ct)中的第6条专门就一般储备基金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例如,央行每年运营后净利润的一部分要累积入该基金;如果该基金的规模小于资本金的一半,所有的净利润都要加入该基金,等等。因此,一般储备基金的变动更为频繁。不过,如果以最近的数据为例,截至2012年3月底,一般储备基金的规模是24.81亿元,是资本金的9.9%,规模较小。另外,新加坡央行也有类似于日本银行的坏账拨备,属于拨备及其他负债项(Provision and other Liabilities)。显然,这里面的一部分也可以发挥损失缓冲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新央行净资产中还有一项较为独特,是货币基金储备(Currency Fund Reserves)。这一项专门用来防范与货币操作有关的损失,也是资本金的补充。从数额上看,这一项也相当重要,2012年3月底为76.71亿元,是一般储备基金的近3倍。

韩国的中央银行没有资本金,但在其央行法案(Bank of Korea Act)关于盈余处理的第99条规定,其每

年运营净利润的30%要分配到储备金(The Reserves)中去;韩国银行还可以在政府同意下建立一些针对特殊目的的储备基金。根据韩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其盈余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法定储备(Legal Reserve)、自愿储备(Voluntary Reserve)和未分配盈余(Undivided Earned Surplus for Term)。¹

从表6看出,2008年储备所在的盈余项有显著的增加,以后也保持了增加的势头,在总资产的占比也有所提高。

印度央行的储备基金(Reserve Fund)最开始根据《印度储备银行法》第46条创设,只有5千万卢比,与资本金规模一样。后来这个项目随着黄金升值而不断累加。²从上面给出的表4可以看出,储备基金是在印度央行的银行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中;经过多年的积累,到2012年6月30日已经达到650亿卢比的规模。另外,印度央行根据法律规定还设有两个信用基金,分别是国家工业信用基金(National Industrial Credit Fund)和国

从法律或监管上看,一般经济实体的资本金作为股本,是该实体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并且代表着相应的投票权和管理权;对于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经济实体,法律上对其资本金的规模要求有所不同。

家住房信用基金(National Housing Credit Fund),这两项的规模也在同期达到21.6亿卢比。这些基金都是资本金的补充,构成了印度央行的净资产。另外一点需要指出,即该行还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其他负债(Other Liabilities)”。如2012年中该项目达72635.48亿卢比。这其中还包括内部储备(Internal Reserves)和拨备(Provisions),也可以用来缓冲央行可能会产生的损失。

三、对这些国家央行资本金的比较分析

上面我们围绕着中央银行资本金对五个国家进行了观察,从观察中既可以发现相同的特点,也可以发现不同之处。接下来就将这几个国家的状况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

首先,这五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资本金的实际状况证实了央行资本金与一般经济实体资本金的区别。这种区别既表现在法律规定或监管规则上,也表现在实践运行中。从法律或监管上看,一般经济实体的资本金作为股本,是该实体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并且代表着相应的投票权和管理权;对于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经济实体,法律上对其资本金的规模要求有所不同。例如,监管商业银行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就规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该不低于8%。然而对于中央银行而言,资本金在法律上更多的是象征性的意义。资本金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就像韩国央行。资本金的来源也并不影响中央银行所具有的政府公共机构

表6 韩国银行储备及盈余额与总资产状况(单位:亿韩元)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储备及盈余A	21941	21941	20151	11526	48955	62077	85579.43	96296.81
总资产B	2530337	2212593	3030050	3234602	3123400	3640333	3831876.32	4563408.73
占比A/B	0.87%	0.99%	0.67%	0.36%	1.57%	1.71%	2.23%	2.11%

(数据来源:韩国银行官方网站历年年报 www.bok.or.kr。)

1 有趣的是,尽管韩国银行法规定韩国银行没有资本金,但在其资产负债表上这三项之和仍然被冠以资本“Capital”之名。

2 这里黄金价值增加累计到1990年;后来的价值变化就记录在“其他资产”中了。



的性质。例如，日本银行中有来自私人部门的资本金，但这部分资本金并不代表相应的所有权和投票权。自然，法律上也就没有对央行最低资本水平的要求。从实践运行来看，一般经济实体在满足资本监管规则的基础上会保持一定的资本水平（例如，资本/总资产），并随着自身发展进行动态的资本金管理。但对于中央银行，由于资本金在法律上的象征意义，实践中资本金的规模根据法律的规定往往较为固定，比如日本银行和印度银行，或者只是做阶段性的调整，如中国和新加坡的央行。

第二，如果说资本金对于很多中央银行来讲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那

么资本金原本具有的功能还有没有意义？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中央银行作为一个公共部门，并不以盈利为其存在目的，而是通过执行货币政策服务于公众利益。因此，资本金所代表的股东权益对于央行来讲是象征性的。就像日本银行的情况，其资本金中有来自私人部分的部分，但这部分资金的出资者不是一般意义的股东。资本金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充当损失的缓冲。虽然中央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在其运行过程中仍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收入或损失。如果中央银行发生损失又无法直接在表内进行弥补的话，就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从而伤害其货币政策的效果。因此，实践中我们看

到很多央行的资本金规模非常小，并不意味着对这一功能的要求很小；资本金的这一功能对于中央银行来讲显然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很重要，不过这一功能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来补充。在第三部分相关指标的观察中，我们看到了“储备金”这样的项目。这就是央行用来补充资本金的。虽然具体的项目名称在几个国家的央行资产负债表上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在法律上都被赋予了弥补损失的功能，在数额上也随着总资产规模的扩大而不断积累，与总资产的比重也要远远高于资本金的占比，使其在规模上具有弥补潜在损失的能力。而且，除了各种储备项目，一些央行还有专门对损失的拨

备项目(Provision),这是进一步的加强。因此,从数据上看,几个国家央行的资本金并没有妨碍其较好地执行货币政策。更准确地讲,不但是资本金,而是包括了储备金、拨备等项目的资金一起成为中央银行运行中的后盾。

第三,当然,各国在具体选择资本金的大小、资本金和储备金的相对规模大小上有其自身的考虑。对于很多国家来讲,比如我们观察中的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储备金的规模要大得多;但是,新加坡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从第二部分给出的最新数值来看,新加坡央行的资本规模就相对较大,其资本/总资产的比值7.83%要远远大于其他三家银行的不到0.1%的水平。那么,是什么原因带来这样的不同选择呢?相比于其他几个经济体,新加坡要小得多,其中央银行的总资产规模也就相对较小。同时,虽然资本金在一些央行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但是它也可以更为明确的显示央行缓冲损失的能力,对增强信心更为直接。对于要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加坡,这一点也很重要。因此,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新加坡央行就预先采取了措施来加强其资本金和储备,以避免金融市场环境动荡可能带来的危险。当时,其央行资本金一下从原来的1亿元增加到170亿元;2012年又进一步增加到250亿元。较大的资本金和相对较小的总资产,使新加坡央行的资本金相对规模远高于其他几国。相对较高



的资本水平对于明确地向外部世界显示损失的预防能力、保证中央银行职能的履行,从而保障和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具有相当意义。

第四,本文所涉及的几个亚洲国家各不相同,有属于发达国家的日本和刚刚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有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小国新加坡,还有跟中国类似的人口大国印度。从上面的观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中央银行资本金及相关项目的管理上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那么,立足于我们

自身,中国能够从中获得什么借鉴呢?从日本等几个国家的法律上看,他们都对资本金的数额做出了规定,中国并没有这样的规定。那么,是不是有必要在法律上规定一个确定的资本金量?这恐怕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我们还可以考量。另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都对央行的储备金进行了规定,但中国只以“总准备金”这样的字眼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出现了一次,在央行给出的资产负债表上并没有明确的对应项目。我们只是用排除

法推断这一项目应该是包含在“其他负债”中。而其他几个国家在储备金的规定和记录上都更为细致：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在资产负债表上有相应的项目对应。这样的话，人们在对中央银行的评估上就更为清晰、明确。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完善的空间的。除了储备金，有的央行还有明确的拨备项目，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对我们也有启发意义。如果看日本和韩国的中央银行年报，他们在报告资产负债表时已经精确到个位数。更为清晰、透明、精确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对于树立人们对它的信心是有帮助的；这样的信心带来的预期势必有利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和政策目标的达成。

四、总结

本文就中央银行资本金这个项目对几个亚洲国家进行了观察和比较研究。围绕着中国，我们选取了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印度，他们在央行资本金的法律规定和实践运行上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还有中国可以借鉴的地方。

首先，我们就选择中央银行资本金这个视角进行了阐述，并从理论上

近年来，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中国人民银行面临资产负债表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也在增大（张曙光和张斌，2006），如果能够通过明确资本金及相关项目的管理来为损失做预防，并将这一信息有效传达给公众，应该有助于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

对它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然后，我们就具体选择了五个亚洲国家展开观察和研究，这些选择也有其背后的依据。在确定了所要观察的目标国之后，我们分别对他们的中央银行资本金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上及近年来的实际表现等进行了观察。除了韩国银行在法律规定下没有资本金之外，其他的央行都有这一项目，只是在规模、变化等方面各有不同。从这一基本观察出发，我们发现，央行资本金与一般商业机构的资本金有很大的不同。接下来，我们又结合中央银行本身的一些内容进

行了宏观背景的观察。比如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的目标，还有各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状况——这也可以看作是央行货币政策运行实现的目标。从通货膨胀来看，这几个国家中央银行的资本金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最后，我们在以上观察的基础上对几国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找出中国能够借鉴的一些做法。近年来，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中国人民银行面临资产负债表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也在增大（张曙光和张斌，2006），如果能够通过明确资本金及相关项目的管理来为损失做预防，并将这一信息有效传达给公众，应该有助于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很多可以进一步扩展和深入的空间。这里我们在众多国家中只选择了五个亚洲国家进行对比观察，非常有限。如果能够在未来进行扩展，可能会得到更有意义的结果。另外，对与央行资本金相关的观察，我们只涉及了几个方面。但实际上，还可以做更多的观察，使这一比较研究更为全面。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银行、日本银行、新加坡金管局、韩国银行、印度储备银行官方网站相关信息。
2. Ueda, Kazuo. The Role of Capital for Central Banks. Based on a speech at the Fall Meeting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Monetary Economics, October 25, 2003.

亚洲民族与文化的研究基地 ——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¹

为了对亚洲地区的民族与文化进行综合研究，1957年6月17日，韩国设立了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Asiatic Research Institute）。为了实现其创立目标，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开展了许多活动，诸如出版定期刊物，举办学术讨论会，对特殊的研究项目补助研究经费，出版发行有关亚洲研究的图书，引进并翻译国外图书，附属图书馆的设置及其运营，邀请著名的外国学者以及向国外派遣研究人员等等。中心现任主任是 Lee Jong-Wha。

1961年12月，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正式开展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因此，该研究所尤以独特的社会主义研究而闻名于国内外学界。这虽可以说是由于该研究所成功地取得了社会主义研究的成果，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是韩国最早对社会主义进行研究的机构。该研究所不仅对社会主义进行研究，而且对中国、日本和东南亚进行研究。它还对韩国社会进行研究。该所是韩国国内民间研究所中出版刊物和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所。

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设立7个研究室，即韩国社会研究室、日本研究室、中国研究室、北韓研究室、韩国史研究室、韩国政治思想研究室、社会调查研究室。

韩国社会研究室由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资助，从1978年开始进行韩国社会发展研究事业，研究主题涉及人口、保健、老人问题、青少年问题、阶层问题、老死问题、税利、科学技术问题等。

日本研究室的设置目的是通过对日本社会的全面了解，为韩国社会的发展和韩日关系正常化奠定基础。研究

范围是日本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变动、文化、社会等诸方面以及韩日关系。该研究室由日本基金会援助，开始于明治时代日本研究直到现代日本研究。

中国研究室主要是对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进行研究，并以现代社会主义建立后的中国为对象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从人文的角度探讨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等问题。

北韓研究室主要把中国和朝鲜作为研究的焦点，对韩国开展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韩国史研究室以光复后韩国史学界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即消除殖民史学，确立崭新的韩国政治思想为研究目的。韩国人认为，为了使殖民地统治合理化而歪曲捏造韩国历史的殖民史学给韩国人造成了民族自卑感和畏怯感，因而对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创造崭新的社会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因此要重新描绘韩国史的真实面貌，以便正确理解韩国社会，为去除韩民族全面发展之绊脚石——南北分割而努力。韩国史研究室计划把与研究目的相一致的一切有关韩国史的主题作为研究范围，特别是把消除有关殖民史学、社会的分割，致力于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以及韩国史的世界化等主题作为重点课题进行研究。

韩国政治思想研究室是1996年3月1日新设立的。该研究室通过对韩国政治思想进行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以致致力于探索“韩国政治学的自我整体性”和确立“正确的韩国政治学”为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室计划把以下三个方面作为主要研究任务：第一，进行有关韩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与东方政治思想的研究；第二，从事有关近代化以

1 本文摘编自 www.cnki.com.cn，原载《当代韩国》1997年01期。

后西方政治思想的接受、变化及其价值体系的研究；第三，通过韩国（东方）政治思想和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这一课题探索韩国政治思想。

社会调查研究室是对青少年问题、职业意识问题、学生运动的评价等进行一系列社会调查并单独进行研究，还从事朝鲜的社会文化特征和社会政策问题的研究。

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出版了大量有关亚洲问题研究的书籍，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具体表现如下：

1. 旧韩国外交文书：《日案》1—7卷、《清案》2卷、《美案》3卷、《英案》2卷、《俄案》2卷、《法案》2卷、《义案》、《件名分类·人名索引·外交官年表》等。

2. 旧韩国外交关系附属文书：《海关案》2卷、《统署日记》3卷、《外衙门日记》1卷、《交涉局日记》1卷、《间岛案——统别原案、统别往复案》1卷，等等。

3. 社会发展研究丛书：《韩国社会发展研究》30卷、《韩国产业化问题》（上、下），等等。

4. 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韩国的传统及变迁》、《韩国的未来》、《最近的南北关系与统一韩国探索》、《东北亚安保形势与南北韩统一展望》、《韩中论坛第一次会议报告书》、《韩日共同研究第一次全体会议》（韩语、日语版）、《韩半岛和平体制构筑与韩日关系》等。

5. 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5卷、《韩总联研究》2卷、《北韓统治机构论》、《北韓朝鲜劳动党的形成与发展》、《北韓的经济政策与生产管理》、《北韓社会主义过程研究》、《北韓政治体制研究》、《北韓经济结构》、《北韓法律体系研究》、《韩国统一与体系再合并》、《韩国统一与国际政治形势》、《韩国统一的理论基础》、《马来亚社会主义游击战研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研究》、《中国文化革命研究》、《北韓的现实》2卷、《中国的现实》2卷、《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变动》、《现代中国与北韓研究》、《现代中国与北韓40年》3卷、《社会主义改革与北韓》、《社会主义的危机与生存战略》等。

6. 社会主义研究资料丛书：《北韓研究资料集》（1969—1992年共出版12卷）、《北韓法令沿革集》、《南方劳动党研究资料集》2卷、《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编1、2）、《中国研究图书目录》等。

7. 日本研究丛书：《今天的日本与亚洲》、《日本近代化研究》、《韩日关系资料集》2卷、《韩国和日本》、《韩日关系》、《处于转换期的韩日关系》、《韩日关系的未来》、《超越单一民族社会的神话》、《在日韩国人的现状与未来》、《萨哈林遗留韩国、朝鲜人问题与日本的政治》、《珍贵文献解题》等。

8. 韩国社会科学研究丛书：《韩国资本主义成立史论》、《韩国经济增长论》（1）、《韩国经济的资本积累过程》（1）、《韩国的金融与资本动员》、《韩国的工业经济》、《韩国国际经济论》（1）、《韩国的劳动问题研究》（2）、《韩国农村的村落结构》（1）、《韩国人的价值观研究》、《韩国社会发展与学生运动》、《韩国社会的性质与展望》、《韩国地区发展研究》、《变动的南北韩社会》、《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史》、《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史》、《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文化运动史》（2）、《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民族运动史》（2）、《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民族生活史》（2）、《东南亚论》、《17—18世纪越南的法律与社会》、《共存于朝鲜半岛》等。

9. 韩国研究文献集及亚洲研究藏书目：《韩国研究目录》2卷、《传统韩国资料目录指导》、《亚研藏书目录（1. 东洋书；2. 西洋书；3. 汉籍六堂文库）》。

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的未来构想是以现在积累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特别针对亚洲和东北亚地区进行全面、深刻地研究，并将和有关机构进行共同研究。

联系方式

电话：02-923-1200

传真：02-923-4661

邮箱：arc@korea.ac.kr

网址：http://www.asiaticresearch.org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婍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